

重构共同体想象： 新中国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的编撰

◎李红祥^{1, 2}, 刘兴豪¹

(1.衡阳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2.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教科书是传授学科常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构建共同体学科想象的关键渠道。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新闻史教科书的编撰,以中国史学革命范式为基底,通过对中国新闻史进行重新书写,再造学科常识,重构历史想象,从而对中国新闻史学共同体进行生产与再生产。

【关键词】十七年 中国新闻史学 教科书 共同体想象 革命范式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17)11-097-05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17.11.018

有论者指出,20世纪中国新闻史的书写存在两种范式:一种是以中国媒介自身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化范式;一种由1956年的《中国报学史大纲(草稿)》延续而来,以新闻内容为主体,重在阐释新闻宣传的政治功能与社会作用的革命范式。^{[1](28-32)}两种范式的出场除出于对当时社会政治需要的回应外,还与其时从西方引入的史学观念作为认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思想前提密切相关。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输入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认知方式与书写方式,在新闻史学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裂隙。

然而,范式的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须在其学术共同体内有一个内在革命的过程。但当前文献对这一内在革命的转换过程未能加以详尽阐释,这一过程一直以来被处理成一个“暗箱”。这往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一是新闻史学研究从现代化范式过渡到革命范式是一个跳跃的过程,后者一经出场便直接替代了前者。二

是新闻史学革命范式为学术共同体所遵循是个一蹴而就的过程,似乎在一夜之间为全体成员所接受。其实不然。

为此,本研究将从科学革命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下文为叙述简便,不再标注)新闻史教科书的编撰进行分析,揭示其如何通过再造新闻史学常识,对中国新闻史学共同体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具体从三个方面加以阐释:首先分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输入在中国史学场域内如何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史学革命,并引起国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再认识。这是分析新中国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进行重订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探究新中国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的编撰如何以中国史学革命范式为基底,用一种全新方式对中国新闻史进行重新书写,从而再造了中国新闻史学常识;最后着重分析新中国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是如何通过对新闻史研究的引领示范作用以及具体教学实践对受教育者进行定向生产,从而重构了共同体对中国新闻历史的想象。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报刊舆论与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研究”(12BXW001)

【作者信息】李红祥(1975—),男,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刘兴豪(1968—),男,湖南邵阳人,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新闻史。

一、范式革命：由现代化叙事到革命叙事的转变

库恩指出：“科学研究并不是通过随机的数据积累而进行的，而是依照科学共同体在任何一段时间里，在确切地阐述问题和选择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时，所认为的理所当然的典范性理论的指导而有组织地进行的。”^[2]晚清进化论史观的输入直接导致中国史学现代化范式的形成，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则带来了中国史学由现代化范式到革命范式的重建。

1. 史学现代化范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普遍认为引入西学是构建新知的前提。“中国数千年来安于旧有学识，方自得为文明古国。今日欧潮东渐，民智渐开，乃觉人之文明优于我，我不追风步影，以求其可利于竞争之地位，则必归于天演之公理，此今日吾国民之心理也。”^[3]1898年，严复译述并出版了《天演论》，一时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4]进化论的输入为国人在思考中国过去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梁启超主张用进化论思想指导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演进过程，“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5]他在1901年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撰写了《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书，被后世认为是以现代化范式考察近代中国的滥觞。

梁启超以现代化话语考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运用这种方法对中国历史重新加以诠释。陈恭禄、蒋廷黻是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分别于1934年和1938年以通史形式著有同名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过程是在一种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下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挑战。其中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被认为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6]

2. 史学革命范式

几乎在进化论思想输入中国的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7]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开始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进行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文化经验的说明”，是一种“社会组织进化论”。^[8]他毫不掩饰对唯物史观的赞誉，“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的新纪元”。^[9]

李大钊不仅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同时也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开拓者。他以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往昔之国情”分析“近今之国情”，认为“中国今日政治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10]此时李大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虽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宣传与阐释，却为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前提和知识资源；对近代中国基本历史线索的概括，为以后中国历史研究革命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思路。

库恩认为，当许多重要问题不能在现有范式的范围内得到解释时，科学共同体就会不情愿地逐渐抛弃日益机能失灵的旧有范式。^{[11](79)}一直以来持现代化话语的史学家未能从历史中找出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真正原因，未能找到一条救国求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也未能提出一套有效揭示历史现象与变革动力相互关系的史学理论。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中国史学界急需一种新的理论加以指导，使其走出现代化范式的历史幻象。于是一些知识分子，尤其一批从五四文化运动走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时人共享的进化论思想，采用一种与现代化叙事模式截然不同的宏大叙事——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革命叙事对中国历史加以重新定义与阐释。

作为对当时主流史学现代化范式的抵制与应对，这一时期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相继问世，如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1931）、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4）、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8）、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1946）。其中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影响最大，他本人也因此获得极大赞誉，被认为“是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奠基者”“他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的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数十年之久”。^[12]

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近两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开辟了“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13]新中国成立后，凭借强大的思想

政治运动以及一整套权力运作机制，革命范式最终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且渗透到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国新闻史学自然也不例外。

二、再造常识：中国新闻史教科书的编撰

1. 编撰新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建设也需要社会民众在思想上、精神上获得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新教科书的编撰作为一种联结上层、学界与社会民众的重要纽带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1951年，教育部提出，研究中国必须参考苏联，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教科书。^[14]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苏联最新教科书为蓝本，拟订教学大纲并编写新的教科书，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1956年2月，中宣部召开中央高级党校座谈会商讨制定报学史大纲。会后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参照苏联新闻学专家早前为该班编写的《苏共报刊史概要》演讲稿编写了《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下文简称《教学大纲（草稿）》）。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开始交恶。1958年4月，毛泽东提出苏联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5]^[41]同时提出，艺术问题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15]^[54]最终，贯彻《教学大纲（草稿）》精神为全国各大新闻院系通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没有面世。

1958年8月，中央下文“各地方可因地、因校制宜，对教育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指导性教学计划、大纲和通用教材、教科书进行修订补充，也可自编教材和教科书”。^[16]于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1959年根据《教学大纲（草稿）》部分内容内部出版了《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该讲义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报刊史著作，当时成为各高校新闻专业的基本教材”。^[17]1966年，人大新闻系对该讲义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以《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现代部分）》命名再版。196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根据《大纲（草稿）》部分文稿内部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作为该系新闻史学教材。该书于1962年被杭州师范大学新闻系翻印，作为该校的新闻史教科书。1978年复旦新闻系对该教材进行修改，以《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书名再次内部出版。

2. 再造学科常识

（1）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革命史范式概括为

“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18]这几本教学大纲和讲义的编排体例完全参照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革命运动为框架。《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现代部分）》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这本讲义是根据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党的历史为线索，以党的报刊为主体的方针来编写的。”^[19]^[1]至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分期，《教学大纲（草稿）》把中国近现代报刊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四个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人大版）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复旦版）则完全依照《教学大纲（草稿）》第三章内容把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分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时期。

（2）上述大纲和讲义贯彻了中国史学革命范式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术一定要为政治服务”“薄古厚今”原则。^[20]以评述中国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为主线，对有关史实进行重新整理、分析与解释：在所讲的报刊中，主要选取进步报刊或革命报刊；在所讲的进步报刊或革命报刊中，注重突出共产党的报刊；而在所选的共产党的报刊中，又重在突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刊。《教学大纲（草稿）》一共四编，除第一编是谈中国古代报刊外，其他三编都在讲述近现代的中国报刊；而人大和复旦两本讲义则只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进步报刊。

（3）教科书除建构知识外还建构一定的价值体系。然而任何文本的意义不是自动生成的，须以语言为介质加以建构，人们也只有透过语言才能理解或拥有教科书。剑桥学派认为，语言分为价值无涉的自然语言和具有价值判断的道德政治语言。^[21]为向民众制造政治认同，上述大纲和讲义也像当时的中国历史研究一样使用大量诸如“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敌人”“走狗”“罪恶”“万恶不赦”“丑恶嘴脸”“斗争”“清算”等具有价值指涉的道德政治语言。

综上所述，这些新闻史教学大纲和讲义通过其独特的编排结构、内容体系与写作话语等方式再造了中国新闻史学科常识。不仅将主导阶级自身观念自然化为整个社会的普遍文化，且形塑了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的认知：中国新闻事业史就是一部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的政治、思想斗争史。但罗马不是一天可建成的，“一个新的观念，纵然具备明显优势，但要想让普通大众认可

它，也绝非易事。许多创新都是经过数年时间的沉淀，才被大众广泛接受的”。^{[22](7)}

三、重塑想象：新闻史学革命范式的再生产

库恩认为：“不论是一个发现或一个理论，任何对自然的新诠释都首先浮现于一个或几个人的心中。是他们首先学会以不同的眼光去看科学和看这个世界。”^{[11](121)}1956年中央高级党校商讨制定报学史大纲座谈会的召开，形成了“第一个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团队”。^{[1](28)}这个由几人组成的学术团队怎么能做到或做了些什么，才能转变新闻史学者看待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方式，让整个新闻史学界放弃以前的现代化范式而转向革命化范式？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当时的中国新闻史学界塑造出一个共享革命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安德森认为，想象共同体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23}他认为18世纪初兴起的报纸和小说“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23](8)}同样，新中国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是塑造想象共同体的关键手段，同时也是重构共同体有关中国新闻历史想象的重要工具。

1. 重构新的学术共同体

十七年中国新闻史教科书推动新闻史学革命范式在其学术共同体内渗透，并使之贯穿于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据丁淦林回忆，《教学大纲（草稿）》出来后，当时大学新闻系的老师“莫不喜出望外”，对于“一份如此全面的、系统、完整并有很强思想性的大纲”“毫无疑问地欣然接受”。^{[1](29)}通过对《教学大纲（草稿）》的钻研和学习，从中获取许多教益。宁树攀对当时集中学习《教学大纲（草稿）》的会议记录显示，会上老师们表示以后编写新闻史教材要“以史为经，报刊作纬”，讲明“为什么报刊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宣传什么，思想上反对什么”，阐明党报“为何贯彻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生活”。^[24]当时通过对教科书的学习，新闻史学界习得了中国革命化新闻史学的思想理论、学科界限，研究主题以及研究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对教材的学习，对中国新闻事业拥有共同的历史想象和同样的研究范式，从而变成一个学术共同体。最初在一个小范围内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又把他们的共享的历史想象和研究范式应用到后续的学术研究当中。而他们的研究又为后来者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为其他院校新闻史研究者所效法。如此循环扩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更大的学术

共同体，共享同样的历史想象和研究范式，最终导致新中国前三十年新闻史研究出现的“模式化”现象：一是学习苏联模式，“翻译、介绍、引进、学习苏共报刊史是建国初期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二是强调革命模式，“研究新闻历史基本上往革命史上靠”。^[25]

2. 形塑未来成员想象

霍斯金认为，任何社会、制度和个人层面的一切新现象，都可在教育领域找到自己的缘起。^{[26](52)}学校教育对于为学术共同体输送新鲜的血液发挥着强大作用。而教科书则是将学校教育与未来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培养联结起来的重要枢纽。在新中国十七年的新闻史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以教科书作为中介，不仅将依照新闻史学革命范式打造的新闻史学知识作为一种学科常识传授给受教育者，且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将革命范式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地传递给了受教育者。然而教学过程中知识的传授并不是其最终目标，而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以此为中介实现对受教育者的观念改造才是其最终的着眼点。正如福柯所言，现代权力的作用点不在于肉体，而在于灵魂。^[27]形塑具有革命观念的主体人便成为十七年中国新闻史学教育的核心。《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现代部分）》在其前言中就明确指出：“这门课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得一定的专业历史知识，了解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的新闻事业，在我国现代革命运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起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以便进一步领会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不断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19](1)}早期新闻史学革命范式的采用者通过新编教科书的传授，“给学习者植进一种新而实在的知识力量……给学习者套上一大套新的建构知识的方法系统”。而受教育者“作为全新的自我，他们以新的语言提问、思考，并且书写。结果，他们出产了性质上崭新的知识形式”。^{[26](48)}当这些受教育者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有幸进入学界开展新闻史研究时，新闻史学革命范式的理论、规则与方法便会在不经意间浮现于具体研究当中。

罗杰斯认为：“扩散指的是创新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通过特定的渠道，在特定的社群众传播的过程。”^{[22](7)}新闻史学革命范式——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史学研究范式，以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为中介，通过对新闻史研究者的学术研究进行引领以及透过具体教育实践对受教育者进行定向生产，从而在新闻史学界内一步一步得以扩散，最终形塑了史学研究者关于中国新闻史的

历史想象，在中国新闻史学场域内对学术共同体进行生产与再生产。^[1]

参考文献：

- [1] 丁淦林. 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J]. 新闻大学, 2007(1): 33-37.
- [2] 阿里夫·德里克.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1937[M]. 翁贺凯,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5.
- [3] 雷铁崖. 说言[M]//雷铁崖集.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130.
- [4] 杨度. 金铁主义说[M]//杨度集.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220.
- [5] 梁启超. 史学之界说[M]//新史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92-97.
- [6] 刘凤翰. 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J]. 传记文学, 1967(6): 27.
- [7] 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1471.
- [8]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M]//李大钊文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27.
- [9] 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凯尔的历史哲学[M]//李大钊史学论集.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133.
- [10] 李大钊. 这一周[M]//李大钊文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97.
- [11]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金吾伦, 胡新和,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2] 陈其泰.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93(6): 72.
- [13] 郭沫若. 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M]//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 中国史学会五十年.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4: 8.
- [14]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1949—1981).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484.
- [15] 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M]//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1999.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8[G].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 1959: 3.
- [17] 陈业勋. 《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的作者[J]. 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2(3): 90.
- [18] 龚云. 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定型和主导(1950—1985)[N]. 团结报, 2014-04-17.
- [19]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事业史教研室. 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M]. 内部资料, 1966: 前言.
- [20] 范文澜. 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N]. 人民日报, 1958-04-28.
- [21] 周保巍. “罗生门”与剑桥学派的“修辞”. 社会学家茶座[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12): 84.
- [22] 罗杰斯. 创新的扩散[M]. 唐兴通, 等, 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 [2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4] 宁树攀. 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强化“本体意识”的历史回顾[J]. 新闻大学, 2007(4): 1-2.
- [25] 方汉奇, 王天根.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 99-100.
- [26] 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M]. 刘健芝, 等,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27]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111.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maginati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 of 17-Year New China's Journalism History

LI Hong-Xiang^{1,2}, LIU Xing-hao¹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extbooks are an important tool for imparting common sense and a key channel for building community imaginati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 of 17-year new China's journalism history is based on the revolutionary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has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produced and reproduced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Key words: seventeen years;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textbook; community imagination; revolutionary paradigm